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建设文库

真实与建构

——纪录片传播理论探究

范文德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建设文库

真实与建构

——纪录片传播理论探究

范文德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实与建构: 纪录片传播理论探究 / 范文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161 - 2351 - 5

I. ①真… II. ①范… III. ①纪录片—传播学—理论研究
IV. ①J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129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高婷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39 千字
定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建设文库

编委会

主任：刘俭云

副主任：艾买提

成员：刘彬 牛丽红 朱杰 满宏 杨志平
李克石 静 张兢 范文德 卢毅刚

总 序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建设文库》第一批5部作品，即将付梓印刷。同事们邀我来为文库写一个总的序论，心中的忐忑油然而生。原因很简单：将主题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不同、学术价值不同的5部学术著作，抽象、归纳、评价在一篇文字当中，恐有挂一漏万的疏忽和曲解文意的偏颇。

对于民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突出的学术特征和研究范畴，指向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媒介生态和受众的媒介素养；指向了千百年逐步生成的民族历史、民族心理、生活方式、文化意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指向了地理、地域、地貌、地方的自然环境，并即刻涉入了精神交往的深层结构之中，显现出各民族文化在交互时的边界和关系问题。

在人们感知世界之前，世界是混沌的；而文化的传播和精神的交往则降低了世界的混沌性质。一个民族或族群在共同的历史背景的长期浸润之下，必然创造着共同的文化精神和生活习俗，形成了内部、外部相互交往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一个民族或族群在向另一个民族或族群学习的时候，目的不是成为其他的民族或族群；而是在与历史文化的对话中、在与其他民族或族群的对话中，解释自己，丰富自己，并由此凝聚成民族或族群进化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

2 真实与建构

往的发展程度。”^① 生产力水平，劳动分工的结构，精神交往的程度和层次，决定了一个民族或族群在与其他民族或族群交往时的能力。

西部是一片神奇、充满纷繁文化气质的广阔土地。以甘肃为例：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聚居的自然地理区域。现今有 54 个少数民族成分，有回、藏、东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等 16 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其中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为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13 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中亚撒马尔汗等地被迫东迁的色目人和蒙古人，驻扎在了甘肃临夏河州的东乡地区。以此为主体，融合多种民族成分逐渐形成的东乡族，近年开始西迁新疆伊犁地区和青海省，越出了甘肃辖区。在甘肃狭长的地理区域中，现有甘南、临夏 2 个民族自治州，有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东乡、积石山、张家川 7 个民族自治县；有 39 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面积达到 17.9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39.8%。全省常住的少数民族人口为 239.97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9.26%（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面对这样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凸显了对西北、对西部进行媒介传播现状研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多元化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惯性，有力地构筑了一个民族或族群与另一个民族或族群之间交流、交往的差异，合意达成的理性过程缓慢悠长。在与内地高校传播学者们的交流、交往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生存人群的过往历史和现今状况的浓厚兴趣。因为这里是实施民族志、田野调查的乐土；是思想与思想交锋的前沿。这里完全不同于源自西方传播学理论体系的特定场域，它鲜活地折射出了社会变迁的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不可否认，伴随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现代性，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形式、内容发生变迁、趋同的走向无法避免；但变迁的速度、范围和程度未必一致。

朱杰副教授撰写的《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一书，研究和阐述了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对西北民族地区辖属的民族社区展开田野调查，民族社区的概念以县乡村为轴线，以村落为最终个案对象；然后将研究对象回归于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二是选择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保安族、东乡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等 7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0 页。

个少数民族，展开个案研究。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厘清研究对象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并对客观的社会状况进行定性研究。书中对部分极具典型意义的少数民族社区，以田野调查手记的方式做了呈现，提供了证据，说明了语境；其中不乏一些精彩的叙述和见解。他在2011年7月的田野调查中写下了3万多字的《藏乡迭部访谈日记》，流露了引人入胜的研究风格。

7月20号是行程的第一天。作者在日记中写道：“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位于甘肃省南部，地处白龙江上游的川、陇两省结合部。全县有11个乡（镇），人口5.55万人，总面积5108.3平方公里。迭部古称‘叠州’，藏语的意思是‘大拇指’，是山神‘摁’开的地方。1925年，美籍奥地利裔学者约瑟夫·洛克来到迭部，绘制了迭部的部分地图。1928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迭部做了图文并茂的报道，使迭部为世界所知晓。进入了甘南草原腹地。这是一片与四川阿坝松潘草原连接在一起的中国西部藏区原生态草原。漫山遍野的绿草和矮小的灌木，让我们兴奋异常。草原和森林是人类最早的居所，这种兴奋来自生命的本能。天色阴暗了起来，很快大雨滂沱。草原的天气正如小孩子的脸，时晴时阴。大雨在道路上升腾起浓密的雾霭，过往的车辆都开启了防雾灯和安全灯，寒意阵阵袭来。牦牛如黑珍珠般散落在绿色的草甸上，帐房前牛粪燃起的炊烟袅袅升起。这种景致让人陶醉，甚至忘却了旅途的疲惫。当看到四川省的界碑时，我们知道离目的地迭部已经不远了。迭部虽属甘肃，但地处川、陇两省的交界之处，需要先穿过四川阿坝若尔盖的部分区域才能到达迭部。曾几何时，这里是世上最为边缘，最为野性的居所。进入迭部沟后，草原被苍松翠柏、江流湍急的森林地貌所代替。漫山的参天大树，湍急的白龙江，使我们意识到迭部是名副其实的林区。感受着空气中树木散发出的久违的气息，眷恋起这里曾经‘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场景。如今，禁止伐木已有多多年，环境保护的效果已经显现。”作者对场域的描摹清新自然，信手拈来的文字充满了对调研对象的熟谙。也许，这并不是学者们追寻或赞赏的学术风格，但让别人读懂终归才是著述的目的。

李克副教授撰写的《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及对策研究》一书，研究视野和研究区域定性为甘、宁、青、新4省区，研究样本的选择颇为广泛并具代表性。比如在甘肃所辖的5个

4 真实与建构

地级市、2个自治州中选择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张掖市。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所辖的7县1市中选择了舟曲、碌曲、迭部、夏河4县和合作市；在张掖市所辖的1区5县中选择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书中抽样调查的44个样本，分布涉及西北4省的11个市、22个县、68个乡、151个行政村。共派出283名学生调查员，赴各地完成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新闻媒体（1. 新闻媒体发展情况；2. 栏目设置与运营情况：A. 报纸现状；B. 广播电台现状；C. 电视台现状）、从业者（1. 媒体专业负责人业务专长；2. 媒体专业人员培训方式；3. 引进媒体专业人才情况；4. 媒体人员对创新研究的态度；5. 媒体专业人员流失的情况；6. 媒体专业人员对自身的评价；7. 媒体专业人员对职业满意度评价；8. 受众对民族新闻工作者的看法）、受众（1. 受众基本情况；2. 传播工具普及程度；3. 阅读报纸杂志情况；4. 传播对受众影响；5. 看电视情况；6. 听广播情况；7. 对民族新闻工作者的看法；8. 制约新闻发展因素）。后期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撰写调查报告，进而完成策略研究。全书量化研究的特色非常突出，表现了作者严谨、认真、客观的科研态度。样本的选择精细准确，问卷内容的设计也较为全面。书中对西北甘、宁、青、新4省区大众传播现状的呈现，富有着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卢毅刚副教授撰写的《认识、互动与趋同——公众舆论心理解读》一书，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民族心理对公众舆论意见的影响”这一章节。因为它高度契合了西部地区媒介生态的基本特征，关注了舆论机制和公众舆论建立在社会制度、传播制度、民众平等权利等基础上合意达成的理性过程。正如作者所说：“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和阶段之后形成的。作为依托历史与社会的基点，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它是构成人们的社会共同体，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并据此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心理认同。在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公众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意识范式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留下的印记。对于公众舆论民族性的认可，将深深地植入到民族的性格当中。”

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认为：1. 舆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舆论在依托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主客观环境完成传递的时候，所有的编码信息必须与受众的解码意识协调一致或无限接近；否则，对立的解码意

识就会出现。这是由同质化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意识决定的,这种心理和意识成为舆论引入发生变迁消解的渊源。2. 一个民族或族群与另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对话和交流是永恒的,对话中的矛盾和隔膜是必然的。然而,对话形成的碰撞、交流、协调、整合、创新以及交互后社会舆论环境的形成,有助于社会的平衡与和谐,这就是对话的精神和本质。用以上认知建立起来的舆论环境,应该充满着理解和尊重的暖意。3. 大众媒体传播的舆论信息,由于媒介样式、功能、速度、数量的数字化,信息环境转化为现实环境的过程加快了。在研究“虚拟环境”理论时发现:“虚拟环境”的塑造,并不能对事物、事件的客观真实,建构出物理镜像般的反馈和基因技术般的克隆。媒体的立场,媒体工作人员的社会素养,媒体当下面临的诸多社会因素,都会影响舆论信息无限逼近事物、事件真实面貌的程度。因此,“过犹不及”的说法描述了“拟态环境”塑造时的一种宏观尺度。4. 一个人只要生存在世界上,就会受到来自家庭、族群、地域、历史、文化、信仰、社会环境和社会舆论的控制,进而积淀出观察事物、判断事物的意识和经验。由于这些意识、经验具有的主观性和闭合性,显示了浓重的个体色彩和族群色彩。“框架”决定了公众舆论必须建立认识、互动与趋同的观察视野。

范文德副教授撰写的《真实与建构——纪录片传播理论探究》一书,源于对自己教授专业的热情和经验。纪录片是什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命题。记得2012年5月,新疆师范大学刘湘晨教授应邀来我学院讲学,展映了他拍摄的纪录片原创作品《阿希克:最后的游吟》和《太阳部族》。维吾尔族民间艺人(维语称为“阿希克”),与其说他们是流浪艺人,不如说他们是游吟者和苦行僧的混合体。他们选择不同的职业谋生,只为吟唱他们心中的信仰和对民族文化的挚爱。这部纪录片拍摄了5年时间。在帕米尔高原东部边缘的勒斯卡木村,那里只有7户人家,全部为高山塔吉克族人。为了记录塔吉克人的日常生活,拍摄者在这个村落里生活了7个月。作品充满古典风格,幽静而深邃;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人,在年年必经的“转场”过程中,与人、与动物、与草原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也许,关于纪录片的定义第一次在我的意识里萌生了:那就是真实、原创、坚守和对在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眷恋和深情。本书作者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使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纪录片的产生和形成做

6 真实与建构

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与纪录片的原创性对应，学理的高度恰好给了阅读者一个可以嫁接的学术视野。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发展脉络、传播价值、传播主体、观念与方法、美学、伦理、效果等问题，都可以在书中得到解读和呼吸。

杨志宏老师是文库作者中最年轻的撰写者，职称讲师。他编写的《网络编辑基础教程》一书，是新闻传播学科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产物。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已经无法逃脱数字技术的控制，仅靠笔墨来传递信息和思想了。从1995年开始的互联网元年，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已经如水银泻地般的速度，席卷了整个信息世界。由于作者计算机专业的学历背景，针对文科学生的需要，书中重点讲解了网络编辑环节中需要具备的素质、内容管理系统的使用、网络信息的筛选和管理、新闻图片的数字化编辑和网页制作的基础知识等内容。观察国内已经出版的网络编辑相关教材，在网络编辑的互联网技术或技能方面，鲜有重点强调，对于网络编辑日常使用的CMS（内容管理系统），尚无教材涉及。《网络编辑基础教程》的出版，无疑填补了此类空缺，改变了“和者盖寡”的教材布局。

恩斯特·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① 伴随着智慧和才华，我们的老师们并没有在高校的讲台上停滞下来。也许，此次文库诸种著述的出版，仅仅意味了学习的重要性；但进步的印记会蔓延开来，就像5月的夏花一样充满生机。期待着读到来自文库其他老师们的更多作品，那是学问和积累增长的点点滴滴。

最后谨向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和文库的责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孔继萍女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刘俭云

2013年3月27日

^① 转引自庄晓东主编《传播与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章 真实与建构

——纪录片的传播概念研究	(7)
第一节 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研究	(7)
第二节 纪录片概念的多种界定	(13)

第二章 选择与旨趣

——纪录片的传播类型研究	(23)
第一节 纪录片传播类型的研究	(23)
第二节 纪录片题材类型研究	(28)

第三章 经典与源流

——世界纪录片的传播历史	(59)
第一节 世界早期经典纪录片	(59)
第二节 世界纪录片的发展	(74)

第四章 发展与流派

——中国纪录片的传播历史	(87)
第一节 中国纪录电影的传播历史	(87)
第二节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传播历史	(93)

2 真实与建构

第五章 意义与影响

——纪录片的传播价值研究 (113)

第一节 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 (113)

第二节 纪录片的文化价值 (119)

第三节 纪录片的审美价值 (133)

第六章 伦理与姿态

——纪录片传播中的人文精神 (144)

第一节 人文精神的内涵 (144)

第二节 纪录片传播中的人文精神 (150)

第七章 形态与审美

——纪录片传播中的纪实美学思想 (158)

第一节 纪实美学思想探析 (158)

第二节 纪实美学理论与纪录片创作 (164)

第八章 编码与解码

——纪录片的传播语言研究 (170)

第一节 纪录片传播中的声画语言 (170)

第二节 纪录片传播中的蒙太奇语言 (178)

第九章 理念与完形

——纪录片的传播观念与方法 (185)

第一节 纪录片的传播观念 (185)

第二节 纪录片的传播方法 (191)

附录 历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奖名单 (207)

主要参考书目 (216)

后记 (218)

有史以来，所有的经典作品给予我们的绝不是解决办法，而是清醒的认识，并不是答案，而是富有诗意的坦诚，它们对人类世世代代为做一个人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作出了不容忽视的揭示。

——美国影视理论家罗伯特·麦基

自然科技类纪录片《植物的生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亚马逊王莲为了传宗接代，有着非凡的技巧：它那鲜艳的白色花朵在晚上开放时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吸引甲虫钻进了它的花蕊，这时它却把花瓣合上，把小甲虫关在了里面。到了第二天晚上，当这个美丽的“监狱”再次敞开大门把小甲虫释放出来时，小甲虫浑身沾满了花粉，而这朵花却一点香味也没有了。于是小甲虫就飞到了其他刚绽放、香气扑鼻的莲花中去。传粉就这样实现了，王莲这样的传粉方式不仅保证了传粉的充分，而且避免了同花传粉，实现了异花传粉，保证了传宗接代的质量。

对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很难有机会看到王莲这一奇妙的生存现象。然而却能够在自然科技类纪录片中感受到这一点，这和纪录片的思维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纪录片是一种非虚构影片。作为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和媒介产品，在其诞生的一百多年间获得迅速发展，并产生了众多的流派和艺术样式，在世界各地获得广泛的受众和深远的影响。在今天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纪录片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思维品质和文化品格，在当代大众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

2 真实与建构

英国导演约翰·格里尔逊是第一个使用“纪录片”这一概念的人，他在看了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记录南太平洋岛国土著人生活的《摩阿纳》之后，在1926年2月8日《纽约太阳报》上撰文对纪录片这个词作了明确的界定：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自此以后，这一概念的影响持续不断，直到今日，人们一提到纪录片的概念还常常会想起这一界定。

由于工作的关系，十几年前，笔者在中央电视台做纪录片编导时，就开始了对这一概念的反复思考。在我看来，格里尔逊对纪录片的界定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再现；第二层面，纪录片再现现实时要做创造性处理。这两个层面的存在决定了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然而这两个层面的存在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纪录片要记录真实，要给观众展示真实世界的客观图景。这种真实要求尽量排除人为的干扰，减少主观干预，还世界以本来面目。另一方面，纪录片要对现实做创造性处理，对现实世界的存在要做出分析与阐释，而这种阐释是由创作者去做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创作者主观的意识形态烙印，这又与纪录片的客观纪实理想相违，因此，这一纪录片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悖论（paradox）来自希腊语“para + dokein”，意思是“多想一想”。现代人说的悖论指的是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即如果承认这个命题成立，就可推出它的否定命题成立；反之，如果承认这个命题的否定命题成立，又可推出这个命题成立。如果承认它是真的，经过一系列正确的推理，却又得出它是假的；如果承认它是假的，经过一系列正确的推理，却又得出它是真的。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悖论，它们激发了人们求知和精密的思考，吸引了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和爱好者的注意力。解决悖论难题需要创造性的思考，悖论的解决又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全新的观念。

因此，悖论实质上是客观实在的辩证性与主观思维的形而上学性及形式逻辑化的方法的矛盾的集中表现。具体地说，作为客观世界的一个部分或侧面，认识理论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往往是辩证的，即是诸对立环节的统一体；然而，由于主观思维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或形式逻辑化的方法的限制，客观对象的这种辩证性在认识过程中常常遭到歪曲：对立统一的环节被绝对地割裂开来，以致达到了绝对、僵化的程度，从而辩证的统一就变

成了绝对的对立；而如果再把它们机械地重新联结起来，对立环节的直接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这就是悖论。

依笔者之见，纪录片概念的界定即符合悖论的这一特征：命题既互相矛盾，又联系统一。长期以来，理论界对纪录片一致的界定是：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客观记录。这一界定强调对纪录片记录客体——现实世界的尊重，要求记录中尽量减少人为干预；另外，纪录片的学界和业界又反复强调：纪录片是有观点的，是对现实的创作性处理，这一原则又强调了纪录片传播中创作主体的重要地位。因此，从表面上看，在逻辑上这一界定的提出是相互矛盾的，即纪录片是客观的，同时纪录片又是主观的，这显然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然而，我们综观纪录片传播的众多现象，又会发现，这一界定的提出又是符合实际规律的——纪录片既是客观再现又是主观表现，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纪录片概念的提出实际是一种悖论，这一悖论的存在为纪录片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同时也为纪录片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此，才有了今天纪录片创作“百花齐放”、纪录片理论“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实，纪录片的这一悖论现象与人类认识社会的思维现象是一致的，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就有这样一些典型的思维模式。比如：实证主义与解释学/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就存在对立统一的思维特征。在本体论层面上，实证主义方法论范式认为事实存在于人的心智之外，它受永恒的自然规律与机制控制；而解释学/建构主义方法论范式坚持事实是在社会情景中建构的，知识是人的一种建构。在认识论层面上，对实证主义方法论范式来说，研究者是可能探究和了解外在于人的事实，在探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独立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研究者的价值（values）或其他偏见（biases）应该能够被排除；但是，解释学/建构主义方法论范式却强调了主观性的立场，也就是带有价值取向的研究者使用主观的互动与交流的方法接近“他人”的内心世界，因为事实是存在于他人的内心，所以研究者与他人是不可分离的。一个世界，两种研究方法，导致两种不同的认识结果，这和纪录片的本体属性是何其的相似！

纪录片的传播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纪录片要客观纪实，就得让摄像机成为一台无人控制的死板机器，如大街上的摄像探头。那样的结果只能是记录更多表面的真实，卢米埃尔兄弟最早的纪录片

4 真实与建构

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代表。另一方面，纪录片要对现实作创造性的处理，摄影机所拍摄的活动场景、故事就剔除了创作者不需要的东西，剔除了创作者认为不相干的内容，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创作者要透过表面现象探索生活本质的活动，它是对真实的翻译和解释，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建构，是主观的存在。因此纪录片的创作经常在忠实地反映现实与创造性地诠释现实两者之间徘徊，而这正是纪录片的特色与迷人之处：现象世界的真实场景与图像世界的有机建构，两者共同确立了纪录片的本质存在——真实与建构。

美国导演弗拉哈迪被誉为“纪录片之父”，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创作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更是蜚声全球，被认为是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弗拉哈迪为了拍这部片子，到过北极两次。在《北方的纳努克》这部片子中，弗拉哈迪并非反映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全景，而仅仅是以一个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及其家人的生活为典型代表来展现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以一个家庭来代表整个爱斯基摩民族的生活方式，这说明了纪录片实际上是建构出来的，它是一个创作结果而非生活全貌，它是用来传达知识的。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实际移用了故事片的拍摄手法。片中的故事是由弗拉哈迪来讲述，是他发现了故事，并且把这些拍摄的故事片段连接起来，从而构建了这样一种叙事。很显然，这一拍摄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是对意义的建构。

对于纪录片创作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必须建立观点，表达创作者已经认识到或体会到的真理与意味。纪录片和新闻不同，它不会受到编审需要的限制，而新闻却需要遵循编辑的原则来表达某种特定的观点。纪录片要求在作品中阐释创作者个人的观点，“载着自己的思想航行”是被普遍遵循的纪录片传播思想。这一特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格里尔逊的创作中就开始体现。格里尔逊在对大众媒体的传播研究中发现：观众通过观看一部片子的形态，可以给一大批人传达同样的信息，这对民众的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拍摄理念中，纪录片是用来教育民众的，并在社会民主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应有的作用，他把纪录片创作称作阐述作者主张的“讲坛”。

在《煤矿工人》这部纪录影片中，格里尔逊表现了社会大众如何尊重劳工的尊严。这样的呈现方式让我们看到纪录片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在

格里尔逊看来,纪录片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公共领域,关注社会 and 道德方面的事情而非个人的需求。格里尔逊的纪录片,实际上是对生活的提升,对素材的升华。既拍摄真实的生活,同时又在进行解释与创造。我国著名影评家、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在《纪录电影的美学基础小议》一文中写道:“事实胜雄辩,寓褒贬于镜头,未必不能出现纪录影片的司马迁。”这种创作理念在纪录片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

因此,纪录片不管多真实,它都是一种建构,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真相、传播真理、建构意义。从前面提到的纪录片《植物的生存》中,我们对此可以有深入的认识。纪录片的本质是真实。它是记录以人为中心或以人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真实而非臆造的世界的艺术品种。纪录片的主体是为了纪录历史、传播文明、阐明思想而进行创作的影视传媒工作者。纪录历史是纪录片的出发点、是纪录片的重要功能,同时,它也肩负着传播文明、启迪心智的使命。纪录片的传播是主体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反映,所以纪录片的内容是主体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它总是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带着主体的社会倾向、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等,因此,纪录片既是真实的,也是建构的,它的建构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脱离自然的标志之一,文化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得到普遍认可的意义和判断形成了社会规范,因此,文化就具备了教育人、培养人的重要功能,通过文化的培育,可以把一个自然人改造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基于此,民族整体文化的建设,就成为一项意义远大的文化战略。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和形式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传播能力的强弱。纪录片被誉为“人类生存之镜”,它的存在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当代娱乐文化泛滥时期,纪录片更是承担着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作为高品位的影视文化形态,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无论是对社会伦理德行的培养,还是对民族精神素质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纪录片通过长期不断地传播,日积月累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精神领域,诸如价值观念、思想修养、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乃至心理结构等方面,而这些都会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